

蓝琪 主编

中亚史



第四卷

蓝琪 刘刚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蓝琪 主编

中亚史

第四卷

蓝琪 刘刚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亚史. 第4卷 / 蓝琪主编; 蓝琪, 刘刚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158-9

I. ①中… II. ①蓝… ②刘… III. ①中亚—历史
IV. ①K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11873号

责任编辑: 程景楠

版式设计: 智善天下

封面设计: 武守友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中亚史

第四卷

蓝琪 主编

蓝琪 刘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158-9

2018年9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4 1/2

定价: 88.00 元

总 序

蓝琪等同志编著的《中亚史》即将出版，索序于我。我对中亚的历史素无研究，是没有资格写序的，但考虑再三，还是答应了下来。我之所以承命不辞而有“越位”之举者，是因为被作者刻苦治学的精神深深感动。在贵州研究中亚史，条件是很不利的。获得资料很难，对外交流的机会也少，等等。但作者们以极大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十余年坚持不懈，终于获得了丰硕成果。《中亚史》从原始社会一直写到 1991 年，亘古至今，结构严谨，内容充实，实在难能可贵。

我国史学界过去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中亚史，但有一些前辈学者在他们的著作和译著中也涉及中亚史的某些方面或某些问题，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例如，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冯承钧先生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都是精品。今天，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需要深入了解世界，既要了解它的现状，也要了解它的历史。中亚是我国的近邻，研究中亚史很有必要。希望蓝琪等同志继承前辈学者的宝贵遗产，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我还想借此机会谈谈研究世界史的问题。研究世界史，要兼顾整体与局部两个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日益密切联系起来。伴随着迅速全球化的时代，历史学也必须把

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人们迫切要求知道：人类历史是怎样由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成为今天这一密切联系的整体的。只有局部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再者，国别史和地区史的研究如果不放在更加广阔的世界背景下进行，那么它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作用以及彼此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是无法谈清楚的，整体的说明就站不住脚，难以成立。好比一座大厦，如果它的种种构件都不结实，那么这座大厦就只是徒有其表，看起来富丽堂皇，但不久就会坍塌下来。

我国较大规模地开展外国历史的研究，是在 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至今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无论是世界史的研究，还是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研究，都需要继续展开。还有不少空白点，有待填补。我们的任务重，但底子薄，所以更要加倍努力。我老师一辈的史学家都已归道山了。与我同辈（大约在 80—90 岁之间）的史学工作者，在世的也不多了。开拓我国世界史（广义的，包括全球史与区域史、国别史等）研究新局面的重任落在了中青年一代身上，希望各位奋发努力，勇攀高峰。我相信再过几十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定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国际史学界大厦中的重要一员。

齐世荣，时年八十有五

2011 年 9 月 15 日

前言

先谈一下撰写《中亚史》的前前后后。笔者于1983年考入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幸运地成为治中亚史的前辈项英杰先生的学生。当时，导师正在组织力量翻译一批外文著作，计划以后写一部四卷本的中亚通史。历经15年，包括笔者在内的三届七名研究生共翻译了由项师选定的十多种（近300万字）英、俄、日文专著和《大英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其中一些成果已经由《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增刊《中亚史丛刊》（共七册）出版。由于史料匮乏、语言繁杂、史实模糊，以及现有文献资料互相抵牾等困难，直到1998年项师仙逝，撰写中亚通史之事仍未提上日程，但笔者从未意识到先生的这一遗愿将由自己来完成。

2002年，即项师去世四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中亚文明史》汉译本第一、二卷出版，仔细阅读之后，笔者朦胧地意识到写一本中亚史的时机似乎来到了。2003年，笔者接受翻译《中亚文明史》第五卷的任务，在读完《中亚文明史》第五卷英文本之后，撰写中亚史的想法清晰起来。^①同年，贵州师范大学组建

① 《中亚文明史》是联合国汇集世界著名中亚史专家撰写的一部连续性的中亚经济文化史，它代表着20世纪末的研究水平，此书所用资料可以弥补中亚史构建中文明史资料的缺乏。其中，《中亚文明史》第一、二卷的资料可以完成中亚原始社会和古代文明的撰写，《中亚文明史》第五卷中16—18世纪中叶的内容正好填补了国内中亚史研究的空白。

历史与政治学院，笔者不知深浅地把写一部中亚通史的想法向领导汇报，立即得到校领导和院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于是，撰写本书的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2008年，经审批，此课题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08BSS009）。历时10年，《中亚史》的撰写终于完成。

在此，有必要对本书研究与撰写的地理和时间范围做一说明。古代中亚边界是不稳定的，它随时代而变化，随中亚部族与周边文明国家之间势力的消长而变化。一般来说，学术界对中亚有广义、狭义之界定：广义中亚范围指西起里海，东达兴安岭，南自喜马拉雅山脉，北至阿尔泰山；狭义中亚范围仅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两河流域地区。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富汗所在地区，有时候也涉及与它们有关的地区。

本书共分六卷，论述内容起于中亚旧石器时代，终于1991年苏联解体。第一卷论述了中亚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主要内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早期国家的兴起；第二卷论述了封建社会兴起的历史，主要内容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王朝历史；第三卷和第四卷论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主要内容分别是突厥王朝和蒙古帝国的历史；第五卷论述了封建社会衰亡的历史，主要内容是哈萨克汗国、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浩罕汗国的历史；第六卷论述了中亚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和中亚人民争取自治、独立的斗争史，以及苏联时期的中亚历史。

本书体例按通史要求均衡安排，克服了以往同类著作中史料多的地方多写，史料少的地方少写或不写的状况。本书的结构安排可概述为“以编定性，以章定范围，以节定内容”。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除了渐进性的量变外，还存在着突起性的质变；本书力图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根据中亚历史发展轨迹上出现的一些质变点划分时段，并以编的形式做出界定；中亚地区在文化上是一个统一体，但在政治上却一直是分裂的，本书将诸政权统治地区归

纳在章的形式下；在各章以下，本书以节的形式阐述了具体的历史内容，每节基本上控制在 5000 字左右。

本书内容涵盖了苏联解体以前中亚地区存在过的所有王朝，按中国人撰史的习惯，此书可以冠以“中亚通史”一名。但在看了一些学者对“通史”的定义之后，本人决定采用“中亚史”作为本书之名。主要考虑有两点：第一，据《易·系辞》云：“往来不穷谓之通”，“不穷”指时间的无限，贯通一切时间的通史是不可能存在的；第二，严格地说，时间上的通只是通史的必要条件，真正的通史必须具备通史精神。^①对于通史精神，施丁教授认为：“不通古今之变，则不足以言通史。”^②中国的中亚史学尚处于起步阶段，欲达到上述境界，尚有待努力。

本书各卷有分述和总述，在对地区政权进行分述的同时，对当时中亚的政治、经济、对外关系以及宗教和文化情况做了总体论述。在分述和总述中，作者力求系统、全面、准确。所谓系统，就是着眼于中亚政权在此时段内的变革过程；所谓全面，就是研究领域尽可能包括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政治、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对外关系；所谓准确，就是客观、求实，向读者展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分述和总述的基础上，作者力求对研究对象进行反思，希望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即通史精神。

此外，本书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做了一些推进性的尝试。如中亚经济和文化的南北差异一目了然，本书在考察中亚原始生产力的发展时，明确了这一差异产生于旧石器时代后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呈现出定居文化和畜牧聚落文化的南北特征。又如，众所周知，中亚是古代东、西方贸易和文化的通道与融合地，本书指出，如果中亚的背后没有一个强盛的汉唐中国，中亚地区就不可能成为东、西方交往的桥梁。

① 参见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施丁：《说“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

对早期中亚的历史进程，本书还提出一些新的思考。如在第一卷第二编第一章第二节中，作者提出中亚地区在铁器时代经历了东方游牧民族迁徙和西方文明（希腊亚历山大大帝）远征的两大冲击，正是在这些外力的冲击下，中亚古代政权（国家）加速形成；又如本书对16—19世纪中叶的中亚国家（或王朝）的性质做了界定，认为16—19世纪上半叶的中亚社会仍然处于前近代时期的封建时代。16世纪以后，远离工业文明发源地的中亚没有出现由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本质变化，中亚国家政权组织和社会结构仍然是封建性质的：哈萨克汗国实行封建领主制与部落家长制结合的宗法封建制度；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贵族代表大会在汗国内外的政治生活中都有重要的发言权，两个汗国都采取了以采邑为基础的统治方式，将行政权和财政权通过采邑转让给贵族统治。中亚诸政权的经济制度仍以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来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国家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封建地租。中亚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是封建性质的，农民与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本书还做了一些十分必要但暂无相关研究的课题。如把中亚原始文化与周边文化相联系比较，并且指出，中亚原始文化发展的进程与世界较先进的西亚地区基本上是一致的。又如探索中亚原始文化的起源时认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中亚发现了西方传入的阿舍利文化，旧石器时代中期中亚发现了以勒瓦娄哇—莫斯特类型为特征的石片文化，因此，中亚从旧石器时代起就具有文化融合的特征；新石器时代，中亚文化受到西亚的影响；青铜时代，中亚南方文化显示出受到两河流域、伊朗和印度河下游地区的影响，中亚北方的草原文化更多地受到了欧亚草原西部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笔者推断，与印度河流域文明一样，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中亚原始文化可能是尼格罗—澳大利亚种（黑种人）的达罗毗荼人创造的；从铜石并用时代起，中亚原始文化的创造者是欧罗巴人中语言属印欧语系的一支人群，即雅利安人。

本书与以往著作的不同之处，各卷的序言中都有说明，在此不一一指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立论方面，中亚历史的很多事件和人物都存在着观点上的歧异，本书对此没有一一阐述，而是在对尽可能多的观点进行比较、分析之后，采取了笔者认为较为客观的一种。需要指出的是，本书虽是集体成果，但各卷的框架设计、资料的采用安排、文字的取舍统一，以及最终定稿都系由笔者完成，因此，全书风格一致，语言统一。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部《中亚史》凝聚了贵州师范大学三代学人的心血，也是笔者学习和研究中亚史30余年^①的一个总结。本书是在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撰写过程中，本书参考了中亚史前辈王治来先生的《中亚通史》，在“中亚塞种国家”一编中，参考了学长余太山的《塞种史研究》等著作；在西辽史、喀喇汗王朝史和叶尔羌汗国史的撰写中，参考了魏良弢先生的《西辽史研究》等著作；在察合台汗国部分，参考了刘迎胜先生的研究；在萨曼王朝部分，参考了学长许序雅的研究；在沙皇俄国统治中亚的部分，使用了学长吴筑星和董兴森翻译的俄文资料（发表在《中亚史丛刊》第一、四册）；在宗教苏菲派部分中，参考了师兄张文德博士的《苏菲主义》等研究。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这部《中亚史》从体例的完整到内容的充实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英国学者休谟在其《论历史研究》一书中说：“历史不仅是知识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打开了通向其他许多部分的门径，并为许多科学领域提供了材料。”^②笔者衷心希望《中亚史》一书能够起到这种作用。

蓝 琪

2014年3月

① 编者于1981年开始准备中亚史研究生的考试，至今30余年。

② [英]休谟：《论历史研究》，见瑜青主编：《经典启蒙文库·休谟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第四卷 序

《中亚史》第四卷论述了13世纪初至15世纪末期近三百年间，蒙古人和突厥化蒙古人政权在中亚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从内容上看，本书继续论述封建制度和封建关系的发展，在世界历史的分期中仍然属于中世纪史范畴；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与突厥王朝时期一样，这一时期的中亚处于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

《中亚史》第四卷分“蒙古帝国时代”、“蒙古汗国时代”和“帖木儿帝国时代”三编。第一编从蒙古人崛起的13世纪初起，止于塔刺思会议召开的1269年；第二编起于蒙古帝国分裂的1270年，终于突厥化蒙古人帖木儿在河中地区确立统治的1370年；第三编起于帖木儿帝国建立的1370年，终于帖木儿帝国灭亡的1507年。

每一编的结构大致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叙述蒙古或突厥化蒙古诸政权的建立过程和统治；第二部分侧重于总体归纳，综述蒙古人或突厥化蒙古人统治时期中亚的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及对外关系，对蒙古或突厥化蒙古政权做出总结和评价。

在第一编中，作者论述了13世纪上半叶蒙古人的崛起及其在中亚的征服和统治。作者指出，蒙古帝国的建立与欧亚大陆当时的形势是分不开的。蒙古人扩张时期，在欧亚大陆东部，中国的领土四分五裂：隔淮河相峙的南宋王朝与金朝分别统治着中国南、北方，

西夏、吐蕃占据着中国西北部，大理国拥有中国西南部。这些政权或孤立自守，或彼此征战；在欧亚大陆中部，12世纪末期靠武功建立起来的花刺子模帝国只是一个帝国的雏形，还未来得及完善与巩固，再往西是刚摆脱塞尔柱人控制却又受到花刺子模帝国威胁的阿拉伯帝国；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欧平原被星罗棋布的斡罗思公国分割，地中海沿岸狂热的信徒们举着“十字”与“新月”的旗帜正在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厮杀，千年帝国拜占庭面临着十字军的征服。因此，欧亚大陆成了蒙古人驰骋的大舞台。大蒙古国陆续征服了中国的西夏、金国和南宋政权，中亚的花刺子模帝国、伊斯玛仪教派的木剌夷国和西亚的阿拉伯帝国，在短时期内发展成为一个地域空前广大的帝国。

在本编中，作者探讨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制度。作者指出，13世纪初期的蒙古帝国是一个奴隶制游牧汗国，成吉思汗创建的千夫长、怯薛等一系列统治制度，为蒙古帝国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3世纪中叶，蒙古社会在被征服地生产力的影响下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在此过程中，汉化契丹人耶律楚材的改革促使蒙古摆脱了奴隶制的影响，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封建帝国。

在本编中，作者重点探讨了蒙古帝国在中亚地区的统治。作者指出，13世纪上半叶，蒙古帝国在中亚的统治基本上有分封、监管和直接统治三种方式。成吉思汗征服中亚以后，将中亚草原地区分封给他的儿子们，形成了蒙古宗王们直接统治的兀鲁思，他们与兀鲁思境内的牧民结成了隶属关系，并以武力维持着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蒙古人在中亚的监管地区主要是蒙古西征之前归顺大蒙古国的地区，如高昌回鹘国及海押立（今卡帕尔城附近）和阿力麻里游牧政权统治下的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地区，蒙古帝国保留了以上地区的国家和统治者的王位，派蒙古官员达鲁花赤监管之；中亚被征服的农耕和城市是蒙古帝国的直接统治区，直接隶属于蒙古帝国，帝国派总督、达鲁花赤等官员管理。

在本编中，作者论述了蒙古帝国统治时期中亚经济、宗教和文

化的情况。作者指出，蒙古帝国的建立消除了东西方陆路交通的人为障碍，打通了欧亚大陆自古形成的商路，促进了东西方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与以往相比，在蒙古帝国时期，中亚社会经济和文化更多地与东方联系在一起，中亚商人垄断了蒙古草原与东、西方的贸易。

蒙古人采取分封分治原则是希望通过“分封”和“封地联合”的形式，以兄弟之间的和谐保证蒙古帝国对广大地区的统治，在蒙古帝国建立之初，这种方式确实起到了团结统治集团，巩固和加强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的作用；然而，分封制是一种实力政治，受封宗王在其封地内组建军队，发展势力，不再听从中央政权的命令，最终导致了蒙古帝国的分裂。

在第二编中，作者论述了蒙古帝国的分裂。作者指出，蒙古帝国初期，蒙古中央靠着帝国大汗个人的能力控制了各兀鲁思的财政和军政，维系着蒙古帝国的统一。窝阔台大汗去世以后，蒙古帝国出现了分裂的迹象；蒙哥大汗时期，钦察汗国实际上已经独立出去；蒙哥去世以后，拖雷家族的汗位争夺战争导致了蒙古帝国的彻底分裂。13世纪70年代，察合台系蒙古人在察合台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察合台汗国。

本编论述了在中亚实施统治的察合台汗国的历史，以及汗国统治下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及其与周边政权的关系。作者指出，蒙古帝国时期，中亚的大多数农耕地区及城市被认为是国家和最高统治者——汗的财产，帝国中央派代表管理和收取赋税，赋税在黄金家族成员中分配；察合台汗国时期，这些地区已经成为察合台家族的财产，察合台汗把这些地区分封给自己的贵族和异密，这些封地被称为苏尤尔加尔。苏尤尔加尔实际上是伊克塔制度的延续，只不过在数量上比伊克塔的范围广得多，不仅对农业绿洲，而且对游牧草原，甚至对封地上的城市也有管理权。察合台汗国统治时期，中亚本地的突厥族和塔吉克族大封建主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积极参与到蒙古政权之中，他们在汗国担任民政官员，或以宗教首领、苏菲教长的身份影响着统治者。

在本编中，作者论述了察合台蒙古人从游牧到农业定居的改变。作者指出，从1265年察合台汗木八剌沙（Mubarak Shah）发布命令禁止军队掠夺农民和破坏农业起，到怯别在中亚实施改革之时，察合台蒙古人的游牧观念发生了改变。怯别将察合台兀鲁思划分成小的行政和纳税区，统一设置万户，确定税率和征税方法，由汗委派的代表进行管理。经过几代察合台宗王的努力，特别是财政大臣马思忽惕伯召集农民（刺亦牙惕）的具体措施，使流亡的农民返回家园，恢复农耕，河中地区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一度呈现出繁荣景象。

在本编中，作者对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和突厥文化的过程做了论述。13世纪下半叶，中亚蒙古人接受并改宗伊斯兰教，思想意识与突厥族居民趋于一致。经过一百多年的融合，到14世纪后期，中亚蒙古人，特别是河中地区的蒙古人，基本上已经伊斯兰化。蒙古人的伊斯兰化促进了伊斯兰教向东部挺进，改变了伊斯兰教在中亚东部徘徊的局面。

在本编中，作者还论述了察合台蒙古人的文化状况。中亚蒙古人逐渐放弃了蒙古语，开始使用突厥语。14世纪后期，在河中地区，以阿拉伯字母书写察合台文的现象普遍；在中亚东部，察合台文与古回鹘文两种文字通用。在察合台语和察合台文的形成过程中，文学的主要内容是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著作翻译成察合台语。

在第三编中，作者论述了帖木儿帝国形成、发展和衰亡的历史，以及帖木儿帝国时代中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状况。作者指出，帖木儿经过10年（1360—1370）的战争，击败了东察合台汗及河中地区的其他异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此后，帖木儿经过30多年的战争，打败了东察合台汗国，收复了被钦察汗国占有的花刺子模绿洲，征服了呼罗珊，洗劫了顿河和伏尔加河流域、北印度等地，建立了一个西起幼发拉底河，东至锡尔河和印度德里，北抵高加索，南临波斯湾的军事大帝国。

在本编中，作者论述了帖木儿帝国在中亚的统治。作者指出，帖木儿帝国是非成吉思汗系的蒙古贵族在中亚建立的政权，建立者

帖木儿为了维护成吉思汗系的正统性原则，一直保留着察合台系汗王，本人只取伊斯兰教突厥君主“素丹”的称号。淡化察合台系的倾向直到兀鲁伯之后才在帖木儿宗王中明显出现。帖木儿帝国的统治具有以下特征：其政府是突厥—波斯式的，既有波斯行政的形式，又有突厥政权统治权与行政权合一的内涵；其法律也具有两重性，兼有蒙古成吉思汗的札撒和伊斯兰教的萨里亚法；帖木儿帝国素丹既是最高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最高行政者。素丹之下设置了一个由七人组成大臣会议，大臣会议的基本分工是：一人管理军事，一人管理包括商业贸易、财政、治安在内行政，一人管理客旅和无主的产业，一人管理素丹王室的宫廷事务，其余三人管理边境和内地事务；地区行政划分为大州、小州，不论大、小州都设置长官三人，一人掌民事，一人掌军事，一人掌无主产业。作者指出，帖木儿帝国的行政机构是松散的，各部之间的分工不明确，职权范围也难以确定。此外，帝国政府是受君主意志操纵的机构，帝国统治者随意干涉政府事务，部下必须忠实于君主，而不是忠实于自己的职责。

本编对蒙古人最终伊斯兰化的情况进行了论述。14 世纪后期，河中地区蒙古人伊斯兰化的过程基本完成。15 世纪，中亚宗教界的情况是：第一，蒙古统治者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利用伊斯兰教为其扩张和统治服务；第二，在统治者的庇护下，宗教界势力增加，宗教组织加强，王权与教权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利用，维持着在中亚的统治；第三，从 15 世纪中叶起，以布哈拉为中心的苏菲派纳格什班底教团在王权的支持取代了亚萨维教团的地位。

作者在本编中论述了帖木儿时期中亚的文化状况。作者指出，帖木儿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察合台系蒙古人后期统治的混乱局面，中亚文化得到极大发展，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文学方面，一批波斯名著被译成察合台语，察合台语步入了文学语言的成熟阶段，产生了察合台语著作；在史学方面，出现了《历史精华》、《帖木儿武功记》、《两幸福之会合》等名著；在科学方面，出现了当时精确度最高的天文表，即兀鲁伯新天文表；在绘画艺术方面，独立的帖木

儿画派形成，它对中亚绘画的影响持续到 16 世纪 20 年代；在建筑方面，这一时期的中亚建筑呈现出综合特征，既保持了突厥建筑特色，又融合了波斯、阿拉伯的建筑风格和吸收了中国瓷砖装饰技术。

蒙古政权和突厥化蒙古政权在中亚统治的近三百年（1220—1507）是中亚民族融合时期。6 世纪，从蒙古草原西迁的突厥族人来到中亚，经过六百多年的融合，中亚印欧种的东伊朗语居民中的大多数走上了突厥化的道路，这是中亚地区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13 世纪初，蒙古人来到中亚，察合台系蒙古人在中亚的统治改变了他们的游牧观念，他们放弃了纯游牧生活方式，开始过定居生活。蒙古人与突厥族居民杂居、通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陆续被中亚居民同化，成为突厥化蒙古人，随着人种和文化的变化，蒙古人的特征开始丧失。蒙古政权时期是中亚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融合，到 16 世纪，中亚现代民族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开始形成。

本卷的分工：察合台、窝阔台、钦察汗国由贵州师范大学刘刚副教授执笔；其余部分由贵州师范大学蓝琪教授执笔。

蓝 琪

目 录

第一编 蒙古帝国时代（13 世纪上半叶）

第一章 大蒙古国的建立和扩张（1206—1225）	3
第一节 大蒙古国的建立	3
第二节 大蒙古国灭西辽	10
第三节 大蒙古国灭花剌子模帝国	15
第四节 大蒙古国征服呼罗珊和阿富汗地区	26
第二章 蒙古帝国（1225—1269）	33
第一节 成吉思汗的分封	33
第二节 王位继承	41
第三节 统治制度的建立	50
第四节 蒙古帝国在中亚的统治	59
第三章 蒙古帝国的对外征服	68
第一节 西征与伊利汗国的建立	69